



世界通史

中國華僑出版社

主编 启智

第三卷

世界通史

我们古老的中华文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应该超越本民族的界域，从整个世界的角度去体悟人类精神的多样性，去体会和实践『四海一家』的人类情怀。因此，每个人都有义务，也有必要了解自身的历史，了解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的历史。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特编撰这部《世界通史》，以期广大读者奉献一种精神上的认知、感动和享受。



中国华侨出版社

第三章

◇ 世界近代史 (下) ◇



世界近代史纪事

马克思恩格斯与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从广义上理解，就是作为完整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从狭义上理解，是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并列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本文涉及的是前者。

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正像任何一种社会思想或理论的产生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一样，科学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阶级斗争和科学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它的创始人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1818年诞生在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城，父亲是个自由主义的开明律师。两年以后，弗里德利希·恩格斯在莱茵省巴门市（即现今伍佩尔塔尔市）诞生，父亲是个保守的工厂主，莱茵区是当时德国经济最发达、政治生活最活跃的地区。1835年，马克思中学毕业后，进入波恩中学，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在柏林期间，他加入了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行列。1838年，恩格斯中学还未毕业，就被父亲送到不来梅一家商号去当办事员，1841到柏林服兵役时也成为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他们从黑格尔哲学辩证思维的宝库中吸取营养，以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高峰为起点，为自己的前进开辟道路。这时，在哲学上他们基本上是唯心主义者，在政治上是革命民主主义者。

马克思大学毕业后，立即投入了反对封建专制和争取民主的政治斗争。1842年10月~1843年春，担任自由主义反对派创办的《莱茵报》的主编，这使他有可能会接触到下层人民的贫苦生活，切身体验到普鲁士国家制度和法律的虚伪性。他在报上发表了许多论文，例如，《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无情地揭露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本质。尽管这时马克思还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影响，但他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已经开始认识到靠纯理论的批判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他对黑格尔



关于法律、历史，以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唯心主义观点产生了怀疑，而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及其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表示赞同。

正当马克思以《莱茵报》为阵地向普鲁士专制制度展开斗争的时候，1842年10月，恩格斯服役期满，来到当时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工人运动最发达的英国，并立即投身到工人斗争的洪流中去，他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并同宪章运动领导人和其他工人组织建立了联系。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转向实际生活，他们同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青年黑格尔派反对哲学同实际相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却主张哲学应当从纯思辨的天国里走向广阔的社会舞台。正是经过实际生活的检验，他们认识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社会观和国家观的缺陷。他们同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已经不可避免了。

1843年3月，马克思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从社会舞台重新回到书房。当时马克思正处在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黑格尔哲学不能回答社会现实提出的问题，费尔巴哈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的强调政治，他的唯物主义与现实也是完全脱离的。为了探求此岸世界的真理，马克思在深入钻研哲学的同时，大量阅读经济学、历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他集中精力批判黑格尔关于国家和法的唯心主义理论，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得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结论。同年10月，马克思为筹办《德法年鉴》迁居到政治生活沸腾的巴黎。在那里，他一面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与法国工人运动领袖和正义者同盟领导人建立联系，结识流亡到法国的各国革命者，一面继续为创立科学的理论而辛勤探索。

1844年2月，《德法年鉴》刊登了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文章指出，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实现人类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些精辟的论断不仅把科学理论对人类解放的极端重要性阐述得一清二楚，而且提出了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必须与科学理论相结合的思想，标志着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为了创立科学理论，马克思从1843年底至1844年3月集中全力研究英、法等国的历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基佐、梯叶里、米涅、梯也尔等人著作中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及阶级关系与财产关系相联系的观点给他很大启发。通过对不同国家历史发展的对比，有助于马克思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中探寻国家和社会的本质，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是，这还不能揭示决定历史发展的最终根源。经济学的丰富知识使马克思意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于是从1844年4月起，他又集中力量钻研政



治经济学著作。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从财富的分配角度对阶级的产生进行了分析，提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但是古典经济学家不了解生产劳动过程所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吸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成果，深入研究生产劳动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不仅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的三种主要形式——工资、利润、地租——的研究，揭示了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对立的经济根源，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得出了如下结论：“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认识到私有制是生产运动一定阶段的产物，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当马克思获得了这个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之后，继续深入地开辟理论发展的道路。他纯熟地应用辩证法研究生产运动的过程，得出了“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的结论。经过艰苦的劳动，马克思吸取了整个欧洲哲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最高成果，终于迈出了通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决定性一步，他宣布：“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如果说马克思是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入手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那么恩格斯则是从研究英国社会状况和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完成这一转变的。恩格斯来到英国的曼彻斯特后，在深入工人运动的同时，钻研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为宪章运动的机关报《北极星报》和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撰稿。在数不胜数的准社会主义思潮和派别当中，恩格斯终于给自己打开了一条通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道路。1844年3月，他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从社会主义观点出发，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论证了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恩格斯批判了英国唯心主义历史学家卡莱尔鼓吹的“英雄崇拜”“天才崇拜”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这些著作表明，恩格斯已经转向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1844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见，他们倾心交谈了各自的政治理论观点，取得了完全一致的见解，从此开始了他们创立科学的世界观的伟大合作。同年，合著了《神圣家族》。这部著作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第一次提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这个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原理，论证了无产阶级解放人类的历史使命。

1845年，恩格斯发表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著作根据大量调查材



料，论证无产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将不可遏制地推动它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并提出了工人运动必须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原理。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逐渐形成，清算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影响就成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进一步完善的必然要求。费尔巴哈把人作为他的哲学的核心，脱离实践，脱离社会，把人的自然属性看做是人的本质，用这种观点解释社会现象只能得出唯心主义的结论，不能正确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1845年春，马克思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着重阐明了实践在社会生活和人的认识中的作用，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检验人的思维的真理性的标准。恩格斯说，这个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至此，决定人类历史发展最终根源的千古之谜终于被揭开了。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现并未使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探索就此止步。他们又从历史发展的一般再深入到历史发展的个别，具体剖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探索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产生了剩余价值学说的萌芽。

在1844年，当马克思钻研古典政治经济学时，对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还没有深刻理解，而是用流行于哲学界的“异化”理论来分析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产品作为一种物化劳动脱离了劳动者，成了劳动者的异己的敌对力量。劳动者生产得越多，他本人所能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的价值就越被贬低。这种异化不仅反映在生产结果与劳动者的关系上，而且还反映在生产活动中，其明显表现就是，劳动像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如果没有强制，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正是他同生产活动相异化的结果。而占据劳动者的成果，支配他们劳动的正是资本家。这就清楚地表明，劳动及劳动产品的异化，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产物，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运用异化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成为通向科学的剩余价值学说的起点。

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促进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而40年代中期，他们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方面取得的成就又为他们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革命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1847年马克思写的《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已不再用“异化”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是把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作为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出发点。他指出，工人以自己的劳动换取生活资料，资本家则用属于他所有的生产资料换取工人的劳动。这种劳动不仅补偿了工人所消耗的部分，而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



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在这里，马克思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剩余价值”的概念，但他已十分明确，在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同他由于劳动而从资本家手中取得的价值之间存在一个差额，这个差额成为资本家财富的来源。

同时，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的基本联系，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资本、利润等经济范畴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抽象。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成为资本，工人的劳动也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成为商品，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建立在“劳动商品”的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尽管这时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还不像他的哲学思想那样得到完整而系统的阐述，还没有明确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这两个对于确立剩余价值学说具有关键意义的基本概念，还没有最终形成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但某些具有决定意义的观点已经提了出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基础已被奠定。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

19世纪50年代，大英博物馆阅览室D行第二号书桌上，每天都堆放着很多书。一次，图书管理员好奇地对那个座位上的中年读者问道：

“博士先生一次可以研究好五十种科学吗？我们的教授通常只能攻读一种专业！”

对于这意外的问题，博士先生风趣地说：“亲爱的朋友，所以也有很多教授戴着遮眼罩呀。人们如果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不能只在一块草原上赏花啊！”

管理员听了很佩服，这位博士先生就是当年流亡伦敦的革命领袖卡尔·马克思。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特利尔城，父亲是著名的犹太律师，学识渊博，略带自由主义色彩。马克思从小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这样的家庭条件，被学校认为是得天独厚，并希望他获得应有的美好前程。马克思在中学毕业时写的一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服务的职业，我们就不会被任何沉重负担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得到的将不是一点点可怜的自私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亿万人，我们的事业虽然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当我们离开人世之后，高尚的人们将在我们的骨灰上洒下热泪。”

这篇气度非凡的作文，被校长赞为“相当好。此文以思想丰富和结构严谨而引人注目。”

1835年秋天，马克思遵从父命，考入波恩大学法律系。在校期间，教授们对他的评语大都是“勤勉”和“用心”，但在1836年8月签发的学业证书上，



校方在“附注”中写道：“据告发，该生曾将查禁的武器携至科伦。”事实真相如何，至今仍不清楚。马克思的父亲早在一个月以前就曾向校方写了一份申请书，表示同意儿子转到柏林大学读书。

柏林大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中心，马克思入学不久便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成了他们组织的“博士俱乐部”的后起之秀。一年以后，他在家信中写道：“没有哲学就不能前进。”父亲当时重病在身，半年以后就与世长辞了。渐渐地，法学已经被列为他研究哲学的辅助学科。1841年春，马克思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表现出他“反对一切天上和地下的神灵”的倾向，开始摆脱黑格尔主义的影响。论文本身获得的评语是“不但思想丰富，很有洞察力，而且兼备渊博的知识。”1841年4月，马克思取得了哲学博士的学位。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便回乡看望已经订婚五年的未婚妻燕妮。他把自己的《博士论文》献给“敬爱的父亲般的朋友”威斯特华伦男爵，也就是他未来的岳父大人。

1842年10月，马克思被聘为《莱茵报》主编。他以战斗的精神，无懈可击的逻辑，撰文抨击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一度因鼓励市民拿起武器反抗政府的税收而被捕，由于他据理反驳，终于无罪获释。

1843年3月，《莱茵报》被查封。半年以后，马克思偕同新婚的妻子迁居巴黎。1844年初，与卢格（1802~1880）合办《德法年鉴》，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文章，第一次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表明他的世界观已经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不久，马克思便被法国政府驱逐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1848年被比利时政府驱逐回国；1849年6月又被普鲁士反动当局驱逐到巴黎；同年8月又被驱逐到伦敦。近40年间，燕妮陪伴马克思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紧密相连，互相支持”，他们的小女儿爱琳娜写道：“我毫不夸大地说，如果没有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卡尔·马克思永远不会成为当代的马克思。”

由于贫困的折磨，马克思夫妇在昏暗的异国他乡，悲痛地埋下了四个孩子。当妻子积劳成疾，马克思为了照顾家务不得不暂时停笔，因而影响《资本论》的写作进度时，他曾说过“最大的愚蠢莫过于结婚”。但是，在他们家中，烦恼总是暂时的，每当他和燕妮的目光彼此相遇时，往往忍不住会立即大笑起来。在爱琳娜的记忆中，她的双亲总是快乐的一对。

燕妮50岁时，马克思回乡看望母亲，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每天我都去瞻养威斯特华伦家的旧居（在罗马人大街），它比所有的罗马古迹都更吸引我，因为它使我回忆起最幸福的青年时代，它曾收藏过我最珍贵的瑰宝。此外，每天总有人向我问起从前‘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和‘舞会上的皇后’。当丈夫的知道他的妻子在全城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个‘迷人的公主’时，真有说不出的惬意。”燕妮病逝时，马克思伤心地说：“如果不承认我的思想大部分沉浸在我



的妻子——她同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开的——的怀念之中，那是骗人的。”

马克思认为，在这个尘世上，友谊是私人生活中唯一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在被利己主义的冰水浸透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马克思特别珍视他和恩格斯在并肩战斗中结下的深厚友谊。在流亡伦敦的岁月里，他们几乎每天都有信件往来。有一次，恩格斯隔了几天没写信来，马克思便在信中风趣地说：“亲爱的恩格斯：你是在哭泣还是在欢笑？你睡着了还是醒着？”马克思一生都非常感激恩格斯的无私援助，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把自己的困难告诉恩格斯。有一次天气非常寒冷，由于缺煤，大白天一家人不得不呆在床上，燕妮噙着泪水央求说：“还是写封信给恩格斯吧！”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与其写这封信给你，还不如砍掉自己的大姆指。半辈子依靠别人，每当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能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俩人从事着一项合伙的事业……”

在伦敦街上，孩子们称呼他“马克思老伯”，为了逗引孩子们，马克思休息时常爱在水盆里玩海战游戏，直到把纸船舰队全部烧毁为止。马克思还和孩子们玩过一种叫“自白”的问答游戏。在问到他的特点是什么时，马克思的答案是“目标始终如一”。马克思终生信守“为人类工作”的道德准则而鄙薄私利，特别是确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以后，更是历尽艰辛，把自己的一切献给革命，最后病逝在工作台前，年仅65岁。

烧炭党人与意大利民族的觉醒

意大利西濒第勒尼安海，东临亚得里亚海，南临爱奥尼亚海，北面横亘着的著名的阿尔卑斯山脉，像一座天然屏障，把它和欧洲大陆其他部分隔开。

意大利具有光辉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它是古代罗马帝国的本土，文艺复兴运动的故乡，又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摇篮。在意大利历史舞台上，曾经演出过许多威武雄壮的史剧，出现过不少举世闻名的人物。他们的活动曾对人类历史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自从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国度长期陷于四分五裂、纷争不息的局面。中世纪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大大地削弱了这个国家的力量。割据一方的封建诸侯则在这两个权力中心择主而事。外国势力趁机对它施展阴谋，肆行侵略。

公元14世纪，意大利点燃了文艺复兴的火炬，它的火焰照亮了整个欧洲，也振奋了意大利的民族精神。无数爱国志士开始思索着如何重新统一自己的祖国。可是，外部的侵略却使这刚刚迸发的统一的火花熄灭了，从16世纪起，西班牙、奥地利和法国相继侵入意大利。1521~1713年间，西班牙占领了意大利



的大部分领土，建立了几个西班牙统治的国家：那不勒斯王国、西西里王国、撒丁王国和米兰公国。接着，奥地利的势力渗透进来，它和西班牙展开长期的争夺，最后于1713年签订《乌特勒支和约》。米兰、曼图亚、那不勒斯和撒丁岛都成了奥地利的属地。西班牙只剩下孟菲拉公国、米兰的一部分和西西里岛。

1796年拿破仑率领军队侵入意大利，独占这个国家达20年之久。1815年拿破仑帝国垮台。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规定，它被分割为8个封建小邦。奥地利的总督统治着北部的伦巴底—威尼斯，并且控制着托斯卡纳、帕尔马、莫登纳、卢卡等公国。西班牙的波旁王朝恢复了对两西西里王国的统治。法国军队驻扎罗马。只有撒丁王国是个独立国家。欧洲神圣同盟的核心人物、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主持了这次瓜分。他在分割了意大利之后，宣称：“现在的意大利只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已”。

千年的分裂和外国长期的专制统治，使意大利民族被窒息，几乎处于麻木状态。当时情况正如马志尼所说：“整个意大利，随着大笔一挥，自由被剥夺，改革被取消，希望幻灭了！”但是，到了19世纪初，这个民族又重新苏醒，展开了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伟大斗争。

1815~1830年，意大利的统一运动是以烧炭党人的斗争为标志进行的。19世纪初，以争取意大利民族复兴为目的的秘密会社纷纷成立，烧炭党是其中最大和最活跃的一个^①。这个爱国组织的成员大多数出身于下层劳动人民。拿破仑帝国覆亡后，数以千计的复员军人和失业的文职人员参加进来，成为中坚力量。他们在意大利一些城市组织暴动，采取恐怖手段暗杀外国官吏，焚毁仓库，偷袭军营，打击敌人。

1820年，在西班牙革命的影响下，烧炭党人发动了那不勒斯起义。前拿破仑军队的军官佩帕将军率民兵1万多人，于10月开往首都那不勒斯城，要求立宪。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一世吓得卧床不起。他一面被迫同意改组政府，颁布宪法，一面暗中向奥地利求援。1821年3月，奥地利出兵镇压了这次起义。数以百计的烧炭党人被逮捕和被处决，数以千计的爱国者被迫流亡海外。

由于许多著名烧炭党人逃离国外，巴黎和伦敦成了爱国志士活动的中心。这两个地方都成立了密谋反奥的国际委员会，继续筹划革命。1831年，烧炭党人经过长期准备之后，又在莫登纳发动起义。由于莫登纳大公的背叛，这次起义又被奥地利军队镇压下去了。

烧炭党人是近代意大利民族运动的先驱。他们为意大利的统一事业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对于促进意大利的民族觉醒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烧炭党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组织上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强调密谋起事和恐怖活动，未能

^① 拿破仑入侵意大利后，他的暴政激起意大利人民的反抗。1807年一些反抗者避入那不勒斯南部林区，扮作烧炭工人，建立了烧炭党。除烧炭党外，当时在北部还有联邦党和兄弟党，在教皇辖地有黑别针党（因其成员领带有黑别针，故名），拉蒂尼斯蒂党（Latinist意为研究拉丁文的人）等等。



充分发动群众起来斗争。1831年以后，烧炭党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逐渐下降。

青年意大利党的斗争

青年意大利党的创始人是意大利民族愿望出色的表达者、资产阶级革命家、民主派领袖朱泽培·马志尼（1805～1872）。

马志尼出生在热那亚的一个医生家庭，自幼受父母的熏陶，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烧炭党人英勇献身、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动了马志尼。马志尼如饥似渴地阅读文艺复兴时期和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的进步书籍和有关意大利的历史著作，为他的成长打下了思想基础。马志尼把国家的危亡时刻牢记心里，黑色丧服每天穿在身上。他大学毕业后，在热那亚办报纸、撰写政论文章，热情宣传反奥的爱国主张。1827年，他加入烧炭党，参加了1830年的起义。起义失败后，因内奸告密，他被逮捕，并被驱逐出意大利。

马志尼被逐后来到了法国马赛。在这里，他回顾、总结了烧炭党以往的斗争经验和失败教训。他感到，烧炭党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它成员复杂，组织不严密，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统一的指挥。在斗争策略上也存在严重的错误：忽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只相信少数人的密谋暴动。马志尼下决心改造烧炭党。他在意大利爱国侨民中开展宣传工作，在他们的帮助下，于1831年创建了新的革命组织——“青年意大利党”，还创办了机关刊物《青年意大利》，作为传播革命思想和指导统一运动的工具。青年意大利党的成员，主要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也有城市手工业者、工人和贫民。青年意大利党成了资产阶级比较激进的派别——民主派的核心。这个党有较严格的组织纪律，参加者的年龄限制在40岁以下，须经党员介绍，并要宣誓严守秘密，倘若违背誓言，将招致神明愤怒和同人共弃。青年意大利党有自己的旗帜，它是一面绿、白、红的三色旗。旗子的两面，分别写有“独立、统一”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字样。

马志尼为青年意大利党制定了政治纲领：推翻奥地利、西班牙的统治、消灭各邦封建割据势力，建立一个以罗马为首都的、独立、统一和自由的共和国。马志尼还规定了青年意大利党的斗争手段是教育与起义，即教育人民群众提高民族觉悟，通过武装起义实现独立、统一的目标。他号召青年意大利党人要吸引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以便尽可能用最大力量走向战场。他认为，自由之树，只有当它用公民之手培植起来，用公民的血加以灌溉并靠公民的勇气加以保护的时候，才会开花结果。马志尼创建的青年意大利党为统一运动提供了一个比烧炭党更为坚强的革命组织，在意大利人民面前举起了统一运动的大旗。马志尼成了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袖。

青年意大利党很快就在国内发展了组织，建立了支部。1833年，意大利著名的民族英雄、统一运动时期的卓越的军事家朱泽培·加里波第（1807～1882）



加入了青年意大利党。

加里波第出生在尼斯一个水手家庭。他在少年时期深受母亲以及启蒙老师阿列纳的影响。母亲向他诉说了意大利民族的苦难，使他深深地同情和热爱人民群众；阿列纳教他本国语言和历史，使他十分崇敬和爱戴自己的祖先，对意大利的悲惨现状感到屈辱、愤怒。他的故乡尼斯是个风景如画的古老城镇，它加深了他对祖国山河的热爱。父亲带他远涉重洋，艰苦的航海生活既锻炼了他的意志和体魄，也开阔了他的眼界，这对他以后献身意大利民族解放事业有很大影响。他15岁到了罗马，面对这个“残存的古代文物的废墟”，他感到古罗马好像是个“被废黜的皇后”，“想到她的不幸，她的衰败和苦难”，便点燃了“要使那备受列强角逐蹂躏的民族得以复兴的热情”，他立下重建罗马、拯救意大利民族的决心。从此，他一直奋战到意大利的完全统一。加里波第离开罗马以后，继续从事水手的工作，承受了艰险的磨炼。在去利凡特^①的航途中，他的船连续三次遭到海盗的洗劫。最后一次，水手们与海盗展开了激烈的搏斗。不满20岁的加里波第表现十分勇敢，他沉着、机智，于混战中以准确的枪法击毙了海盗头子，吓得海盗仓皇逃遁。加里波第说，经历了这场殊死搏斗，他再也知道什么叫恐惧。

年轻有为的加里波第已不满足于一般的水手生活，他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833年，在亚速夫海岸俄国小城塔甘罗格，加里波第结识了青年意大利党人库涅奥。库涅奥向他介绍了马志尼和青年意大利党的主张，使他看到“这个不幸的国家已出现了一线曙光”。他感到振奋，“原来，正有一些人为拯救意大利而献身！”接着，他在驶往君士坦丁堡的航途上，又遇到了几位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从他们那里接受了“把自己的宝剑和鲜血献给正在对暴政进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思想。这次航行归来后，船抵马赛，他会见了马志尼，并参加了青年意大利党。加里波第立即投入了马志尼发动的革命斗争。

青年意大利党积极开展宣传活动。短短两三年间，它的独立、统一的主张已为人们所了解，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青年意大利党在皮蒙特和伦巴底地区都建立了活动基地。马志尼对刚刚即位的撒丁国王查理·阿尔伯特曾寄予希望，他呼吁国王站在反奥的民族运动的立场上。但是，国王拒绝了马志尼的呼吁，青年意大利党人在皮蒙特的活动也受到了限制。于是，马志尼决定发动武装起义，以便推翻查理·阿尔伯特政权。

1833年6月，青年意大利党人鲁芬尼兄弟及其追随者深入到热那亚撒丁王国军队中间，准备密谋暴动，试图夺取热那亚。但因泄露了机密，鲁芬尼兄弟等人被捕遇难。

马志尼对此非常悲愤，决定从国外发动远征，进攻萨伏伊，推翻撒丁王国政府。他在《青年意大利》上撰文号召青年意大利党人和人民群众：“意大利人！是时候了，如果我们想保持声名，就必须让我们的鲜血和皮蒙特烈士的鲜血流在

^① 指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



一起。”他从马赛到了日内瓦，亲自筹划并参加了对萨伏伊的远征。刚刚加入青年意大利党的加里波第，受命到热那亚策动撒丁王国海军起义，以便配合这次远征。

远征军的军事指挥工作，由参加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拉莫里诺将军负责。1834年2月初，远征军分成两个纵队从瑞士的卡劳奇和尼翁同时出发。从尼翁出发的那个纵队，很快就被瑞士政府军全数俘获。由拉莫里诺将军亲自指挥、马志尼随行的那个纵队，虽然进入了皮蒙特地区，由于孤军深入，加上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也被驻守萨伏伊的军队击溃。马志尼因病昏倒在战场上，被人送回日内瓦。由于远征萨伏伊失败，加里波第策动热那亚海军起义的计划流产，加里波第也险些落入政府军手中。

这以后，分散各地的青年意大利党人又组织了几次小规模起义，但是，也都失败了。

青年意大利党人遭到了政府军的镇压，许多青年意大利党人被迫流亡国外。马志尼侨居在日内瓦。为了避开侦探的搜捕，他深居简出，住在一间极小的屋子里，在昏暗的灯光下从事写作、宣传，指导各地青年意大利党人如何进行斗争。1837年初，马志尼被瑞士政府驱逐出境后移居伦敦。在伦敦，马志尼疾病缠身，饥寒交迫，常常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他当掉了怀表、外套和皮靴，仍摆脱不了困境，只能靠撰稿来维持生活。就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他还是坚持斗争。白天奔忙不休，夜间又从事写作、宣传。经过努力，使青年意大利党的宣传、组织工作得到了恢复，并于1840年4月宣布重建青年意大利党。从这以后，青年意大利党继续活动，一直坚持到1848年革命前夕。马志尼流亡伦敦的十余年间，始终没有放弃宣传、教育意大利人民的工作。与此同时，他还与英国政界、舆论界广泛交往，尽力使英国进步阶层了解、同情意大利的民族解放斗争。

马志尼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赢得了意大利人民的崇敬，也使当时欧洲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寝食不安。梅特涅在回忆录中十分感慨地写道：“我和最伟大的兵^①作过战，我曾经做到了使皇帝和国王、沙皇和苏丹^②、君主国和共和国走向妥协，我足有20次卷入和解开了宫廷叛乱的乱丝，可是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人比这个意大利强盗更使我操心：他瘦削个儿，面容惨白，全身衣服褴褛，但雄辩滔滔如狂风急雨，热情燃烧如宗教使徒。狡猾如窃贼，轻快如喜剧演员，不倦不休像正在热恋的人——他的名字便是朱泽培·马志尼。”

在远征萨伏伊失败、策动热那亚海军起义的计划流产之后，加里波第被迫流亡国外。他先侨居马赛，后因密探搜捕无法存身，又逃亡南美。在南美，他奋不顾身地为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战斗，积极参加了民族解放战争。他先后为里

① 指拿破仑。

② 苏丹，阿拉伯文的音译。意为“君主”或“统治者”。

乌格兰德共和国、乌拉圭共和国的独立而战。他建立了游击队，组织了意大利军团，立下赫赫战功。不但自己成长为一个革命军事将领，而且在意大利侨民中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加里波第在南美的战斗功勋，获得了国际声誉，在意大利也被广泛地传诵。1848年当他返国时，加里波第是作为对意大利有很大号召力的、带着几十名军事骨干来投入革命运动的一个英雄。他在南美的战斗，实际上也为开展意大利民族解放战争作了一次演习。后来，加里波第为统一意大利建立了“震天动地之伟勋”，并非偶然。

在马志尼、加里波第等人流亡国外期间，国内的青年意大利党人仍在坚持斗争。1834年远征萨伏伊失败后，少数青年意大利党人在南方的卡拉布里亚地区建立了青年意大利党的分支——“青年意大利之子”。1844年，青年意大利党人、威尼斯军官班迪耶拉兄弟组织了远征军，打算与“青年意大利之子”配合，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他们把行动计划写信告诉了在伦敦的马志尼。英国当局截获了这封信以后，通过维也纳把消息转达给了两西西里王国国王斐迪南二世。结果，远征军在卡拉布里亚登陆后就被宪兵逮捕了。班迪耶拉兄弟等人被判处死刑，他们高呼“意大利万岁”英勇就义。这次起义失败，标志青年意大利党的斗争转入低潮。

以马志尼为首的青年意大利党领导的起义为什么也失败了呢？这是由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马志尼制定的纲领有错误。他在提出“教育与起义”这个正确的口号的同时，还提出了“上帝和人民”这个口号。马志尼把参加民族统一运动说成是每个意大利人应尽的宗教义务，是完成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既然是出于对上帝的顺从，就不应当考虑“自私的、鄙薄的”物质利益。这样，马志尼就不能提出与广大农民切身利益有关的土地问题，因而就不可能把广大的农民发动起来。马志尼和青年意大利党人不能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斗争，也就无法避免烧炭党人所犯过的错误，仍然只能靠少数人密谋暴动。因而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由于马志尼等人积极的宣传，独立、统一的主张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但是真正奉行马志尼纲领的人，除了那些满腔热情的爱国青年以外，其他方面的人并不多。因此，马志尼和青年意大利党人发动的多次起义，既没有人民群众参加，也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其次，马志尼所代表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政治上十分软弱。19世纪30~40年代，意大利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工业方面，丝织业、棉织业、冶金业、机器制造业相继出现，铁路也开始修筑，工业革命已经开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农业中也有发展，出现了不少资本主义的大农场。但是，意大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工业革命都是在外族压迫、国内分裂、封建贵族当权、国内经济占主要地位的仍是落后的农业等情况下进行的。这就使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革命遇到了很大阻碍。而且，资本主义工业也只是局限在伦巴底—威尼斯地区和撒丁王国这些原料丰富、技术基础较好的地方；就是这些地方，手工工场仍然占居优势。资本主义的大农场也集中在北部地区。广大南部地区，资本主义经济成份





很少。总的说来，意大利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势力薄弱，还没有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所以，意大利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人数少，力量小。他们的经济实力薄弱，造成了他们政治上软弱。他们备受压抑和挫折。因此，他们强烈要求推翻外族压迫，结束国内分裂割据局面，废除封建统治，实行民主改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他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关系，必然成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是资产阶级的民族派。同时，他们为了生存，又与封建统治阶级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有稳定收入，他们还购买土地，成了土地所有者。这样，他们害怕农民，拒绝土地革命。这是他们政治上的软弱性。工商业资产阶级即资产阶级民族派政治上的软弱，就使马志尼为首的青年意大利党不可能提出土地革命纲领，不能广泛地发动群众，最终必然要遭到失败。

再次，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形成及竞争，削弱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力量。由于意大利工商业资产阶级人数少，因而农业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在意大利资产阶级构成中占了较大的比例。农业资本家、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与封建统治者特别是各邦国的王公贵族的关系又极为密切，而且他们当中有些人本来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员。他们靠封建王朝庇护，享有特权，既经营土地又兼营资本主义企业。他们非常害怕农民，反对革命。他们对外族压迫、国内封建专制虽然有时也表示不满，但是没有立即改变现存制度的迫切愿望。他们只希望开明君主颁布宪法，为自己参加政权、增加产业开辟道路。他们认为，马志尼的纲领过于激进，以革命方式实现统一、建立共和国是危险的空想。因此，他们主张与君主合作，在王朝的旗帜下通过兼并战争逐步实现统一。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派。自由派的形成及竞争，更削弱了民主派的力量。这是马志尼为首的青年意大利党斗争失败的又一个原因。

撒丁王国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基地。萨伏伊王朝统治下的撒丁王国，是唯一由意大利人当权、经济比较发达、并拥有一定实力的邦国。国王查理·阿尔伯特比其他邦国君主重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无论从民族感情还是从经济利益上来说，撒丁王国是自由派存在并赖以发展的地方。在这里，首先建立了被称为“阿尔伯特分子”的自由派组织。这个组织狂热宣传在萨伏伊王朝的旗帜下统一意大利的主张，它们拥戴国王查理·阿尔伯特，称他为明君圣主。1847年创刊的《复兴报》，是这个组织的喉舌；《复兴报》的创办者卡米洛·本索·加富尔（1810~1861），则成了自由派的著名领导人。

加富尔出生在都灵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个顽固守旧的侯爵，曾任都灵警察局长多年。母亲也是贵族出身。少年时代的加富尔，桀骜不驯。他继承了先辈统治他人的习性，但又对他们的因循守旧不满。他16岁进入都灵陆军学校，开始发愤读书。由于经常来往于热那亚等城市，他逐渐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影响。他原任军职，因同情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被贬谪到一个偏僻的小城任工程监督官。他抑郁不得志，不到一年便辞职了。他游历了法国、英国和比利时，